

文化视线

金秋时节，古歌大地到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连日来，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组织广大村级书画社，走进乡村、进社区、入企业、进校园，进一步弘扬书画艺术，培育乡村文明，传播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组织广大村级书画社，走进乡村、进社区、入企业、进校园，进一步弘扬书画艺术，培育乡村文明，传播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健全组织，壮大乡村书画队伍

2001年，一大批退休老干部书画爱好者成立了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旨在培养书画人才，传播社会文化，推动文明创建。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多次组织开展观摩、采风、书画展等活动，为老年书画家协会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武建军当选第四届老年书画家协会主席。他将协会工作与党委的大政方针紧密衔接，与天津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融会贯通，抢抓机遇，大胆探索，主动参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村级传统文化书画社建设，广泛开展书画进农村、进社区、助推乡村文化振兴，走出了一条书画家协会自身发展、助力发展的天津路径。

2017年，荣成镇北原汾阴书画社发起人杨俊学，退休回乡后创办天津首家农村书画社，开启了村级书画社建设先河。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以此为契机，多次与乡镇（街道）联系，宣讲建设村级书画社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基层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天津市以汾阴书画社为示范样板，定标准、定计划，促落实，要求村级书画社做到“五有”，即有机构、有队伍、有场所、有制度、有活动。全市村级书画社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每年都有15个村级社挂牌。截至2023年8月，协会共成立乡镇书画分会9个、村级书画社93个，其中农村87个、社区书画社6个。天津市书画协会会员达到1385人，基本实现了书画人才乡村全覆盖。其中发展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56人、省级会员116人，天津市老年书画协会被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批准为会员单位。五年来，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扎根基层，奉献余热，成为农村精神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协会内部统筹发展，先后健全完善各专业委员会，成立了女子书画院、培训中心和6个书体绘画专业委员会，2020年又组织成立了天津市农民书画研究会。内设机构之间各有侧重，上挂下联，同心协力，推动协会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开展活动，巩固农村文化阵地

近年来，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一手抓提高，一手抓普及。依靠村级书画社，每年举办两次临摹展览，展出书画少则100多幅，多则200余幅，以展代培，引导村级书画活动健康发展。坚持每月一次书画大讲堂，组织专业人员现场讲解和点评，全面

书润乡村韵满天

——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纪实

■吴晓征

提高农村书画专业水平。村级书画社成立坚持到场祝贺并赠礼送墨，给予实打实的支持。南桑峪、米家关、西光德等村，村级书画社基础设施就是因为协会的支持逐步得以完善。柴家镇下牛村村级书画社，采取“成员捐一点，大户集一点，村委会挤一点”三条腿走路的办法，有效解决了日常活动经费。从2019年开始，天津市委老干部局、天津市文联、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连续五年举办全市农村书画社书画艺术大展活动，每个书画社推选三名选手参加，邀请外县评委当场打分，当场排出获奖名次，当场颁发奖金、奖牌、证书。对于书画成绩突出的会员，进行表彰授牌，树立标杆。目前已有24人被天津市文联、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授予农民书法家、乡村书法家称号，有27人被授予农村书画优秀传承者称号，13人被授予老年书画终身成就奖。2023年5月，成功举办“龙门杯”天津首届农民书画展，其中有100余幅农民书画作品入展。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基层文化生活，助推了乡村文化振兴，受到了群众的称赞和欢迎。山西老年书画家协会前任主席阎文昆，现任主席郭健曾专程到天津调研村级书画社建设工作，并给予高度评价。2020年、2022年，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先后被授予全省老年书画工作突出贡献奖、全省老年书画先进单位。武建军同志个人被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两度（2019年、2021年）授予优秀个人会员称号。

书画惠民，服务广大群众

农村书画社的成立为农村搭建了一块文化阵地和舞台。广大农村书画爱好者积极参加村级文化活动，编村志，建村史馆，参加乡村重要节点纪念活动。农村婚丧大事中，书画社成员题写贺联贺词，赠送挽联挽幛，积极倡导文明风尚。天津市、乡、村三级书画组织为百姓婚丧事服务，每年都不少于6000家。近年来，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共举办县市级大型书画展5次，参加全国性书画交流活动6次，涉及会员1200余人次。天津市乡镇（街道）共举办农村书画展20余次、村级书画展50余场。在每年组织的书春活动中，农村书画社成员均成为主力军。连续两年，每年参与书春活动都在3000人次以上，书写春联4万余副。一些书画社还主动办起了书画培训班，推动书画活动开展。与此同时，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因势利导，开办书画大讲堂，举办各类书画展，召开经验交流会，促进了老年书画事业健康发展。目前，天津市村级书画社已牢牢占领农村文化主阵地，树立乡村新形象，传播文明正能量，有力促进了乡村文化繁荣振兴。

书润乡村兴，画现美景图。天津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将坚定信心，认准路子，脚踏实地，推动村级书画社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磅礴的文化力量。

展示古代货贝特色魅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图为11月5日，稷山县后稷货贝博物馆馆长拜胜利在整理收藏的货贝。

中华货贝内涵丰富，从红山文化时期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使用时间近3000年。到秦朝时货币统一，货贝才停止了使用。

稷山县后稷货贝博物馆创建于2018年12月，收集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多种货贝，包括石贝、玉贝、蚌贝、古贝、琉璃贝、陶贝、木贝、青铜贝、银贝等二十五类共计3031个品种。经过专业科学仪器分析，

该馆收集的货贝有等级很高的各种仿贝，包括春秋晋国王室金贝、银贝、蚌贝、仿海贝式铜贝、铜鎏金贝、透明骨贝、玉贝等。这些货贝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近年来，稷山县后稷货贝博物馆通过多种方式展示古代货贝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价值，先后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华货贝展”，参与了由中国国际钱币博览会和第三届全国钱币展览会等，引领公众认识古代钱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特约摄影 栗卢建 摄

文史钩沉



最近，笔者由于工作关系，发现永济市存有5通与明代藩王有关的墓志碑。这5通墓志碑，从最早的弘治十七年（1504）《大明山阴王墓志铭》（碑阴：山阴端裕王圻志文），到嘉靖十八年（1539）《大明镇国将军晦轩墓志铭》，最末的嘉靖三十六年（1557）《山阴荣靖王妃张氏圻志文》，时长达半个多世纪。经查阅《蒲州府志》（《永济县志》《虞乡县志》《临汾县志》）和网络相关资料，对明代藩王制度和蒲州城里的藩王有了初步了解，拙笔成文，以贻读者。

优享禄米的寄生集团

在明王朝发展的270多年中，一直有一种特殊群体贯穿始终，他们生活无忧，享受国家俸禄，享有特权，拥有家兵，在自己庞大的封地里可以所欲为，官府几乎无权干涉其家务，只有皇帝才有权过问。他们这个群体，便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分封于全国各地的“特权阶层”——明藩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闰七月，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朝残余势力仓皇北逃。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弱臣强”，朝廷得不到宗室藩屏，于是在借鉴历代分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明代藩封制度。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年（1378）、二十四年（1391）先后将其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于边疆及内地的主要城市，如秦王、燕王、宁王、晋王、齐王、楚王、蜀王等。藩王具体分封爵位为：皇子为亲王（太子以外的皇子一律授予亲王爵位）；亲王子为郡王（亲王之嫡长子，无嫡长子以庶长子，世袭亲王，余子皆封郡王）；镇国将军（郡王之嫡长子世袭郡王，余子皆封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皆降封辅国将军）；奉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皆降封奉国中尉）；镇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皆降封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辅国中尉之子皆降封奉国中尉）；奉国中尉之子皆封奉国中尉（奉国中尉诸子皆世袭奉国中尉，且世袭，不再降封）。这一制度被明朝历代皇帝奉为万世不变的祖训，一直延续至明亡，共计封亲王34位，封郡王900余位，而将军、中尉、庶人，几乎达20万人。

明代藩封制度在初期确实起到了抵御侵略、拱卫王室的目的和作用。朱元璋感叹“朕无北顾之忧”，同时他也觉察到这种制度的危险性，藩王拥兵自重，对皇权产生威胁，故规定诸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年复一年，这些明太祖的后裔，造成明朝财政的极大负担。藩王宗室有赏赐土地的收入，且不用承担赋税任务，朝廷还需要给俸禄，而能够提供朝廷赋税的土地越来越少，承担的赋税丝毫不减，甚至还要加征，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朱元璋从根本上对藩王军事权利进行限制，最终造成了“靖难之役”，使朱元璋绞尽脑汁修订的藩王制度，在他身后第二年，他的第四子朱棣历经四年战乱，夺取了侄子朱允炆（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次子）的皇权。朱棣登基后，在政策上对藩王的限制越来越多，直至形成“藩禁”之制，甚至对省墓、入朝等都作了事无巨细的规定。藩府成员除经济上享有一定特权外，军事权利受到限制，政治上几乎不参与国事。

明代藩封制度在前期对稳定明王朝的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对地方军政制度的有效补充，但其过大的军事、政治权利也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威胁。后期，随着藩王作为军事组织意义的丧失，政治权利也被限制在管理王府内部事务及其所属体系的范围之内，宗室不能做官、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做买卖，不能有其他任何职业，只能被养着，逐渐成为只享禄米的寄生集团，并成为明朝中晚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山阴襄垣两王迁蒲

朱元璋分封的诸王中，山西境内有三个，分别为：就藩太原的晋王朱栢（wǎng），就藩大同的代王朱桂与就藩潞州（今长治）的沈王朱模。这些明藩王们，生活优厚，平时无所事事，普遍一个特点，就是老婆多，孩子多，家族支系不断庞大。封于大同的代王朱桂，明太祖第十三子，明朝第一任代藩王，洪武十一年封为豫王，本来封国选在江西南昌府，古豫章地，因年幼留京师，洪武二十五年改为代王。明太祖死后，大同作为明代北边门户的九边

明代蒲州城里的藩王

董榕 吴军昌 张兴平

重镇之一，明王朝一直有大军驻扎，按说安全与经济生活保障没有问题。但是，由于这里地势偏远，气候寒冷，农作物产量不足，一切供需都要由内地运输供应，再加上北元残余与蒙古瓦剌游牧民族的侵袭，经常处于战争防备状态。代王朱桂性格暴躁，分封到大同以后，在这里敛财掠地，横行霸道，且与地方官员不和，被当地官员多次告到皇帝那里，建文元年（1399）时，因罪被废为庶人。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朱桂的王爵。到明英宗时，蒙古瓦剌的进攻使得大同的安危难于保证，代王府的各位王爷们心绪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同时由于王府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开支花销巨大，入不敷出，明英宗决定将部分郡王内迁。据史料记载，为了去一个富庶有钱的好地方，代王府还吵闹了一段时间。最终，山阴王府、襄垣王府迁蒲州，宣宁王府、隰（xí）川王府迁泽州，灵丘王府迁絳州，怀仁王府迁霍州，唯有老大代世子、老二广陵王和老三潞城王后裔留在大同。

蒲州，位于山西最南端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核心区域，古称蒲坂，史为舜都，先祖尧、舜、禹曾建都于此，唐时为全国六大雄城之一，地势平坦，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又系交通关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到明清一直是河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洪武年间（1368—1398）朝廷又重新对蒲州城墙进行了加固，使其城防更加坚固完整。天顺五年（1461），山阴康惠王朱逊焯与襄垣恭简王朱逊燁（tán）分别带着自己庞大的家眷队伍，浩浩荡荡来到蒲州。至此，蒲州就有了两支大明皇室的王系。

据记载，明朝襄垣国诸王及将军有：襄垣恭简王朱逊焯、襄垣王朱仕燁（cán），襄垣安康王朱仕燁、朱成口、朱聪口、朱俊渠、朱允焯等。来到蒲州的第一个襄垣王朱逊焯，生于明永乐八年（1410），代简王朱桂第五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封为襄垣王，天顺五年（1461）迁出大同，来到蒲州。朱逊焯由于生母早逝，小时候没受到良好的照顾，年轻时就掉了牙齿，平日生活质量堪忧。经过王府搬迁一顿折腾，到了蒲州后就卧床不起。长子朱仕燁在请求朝廷派御医为父王治病的同时，提出以代世子身份代理襄垣王府事。明英宗认为朱仕燁此举是“乘父之病，夺其禄位”，特地写敕书对其进行训诫，并在暗中调查发现朱仕燁之所以会有此举动，是因为两个弟弟朱仕燁（jǐ）、朱仕燁安因以庶夺嫡，即反对其二子予以严厉警告。天顺六年（1462）襄垣王朱逊焯去世，享年53岁，赐谥曰恭简，清《永济县志》记：襄垣恭简王墓，在东县孟石桥北。成化元年（1465）九月，新继位的明宪宗朱见深册封襄垣恭简王长子朱仕燁为襄垣王。朱仕燁，是朱逊焯和萧氏的嫡长子，然而，襄垣王朱逊焯和他父亲朱桂一样，不重视嫡长子，并且与嫡长子的关系势同水火，甚至到了父欲杀子的地步。朱仕燁与弟弟朱仕燁、朱仕燁，为了争夺王位，可以说是互相拆台、相互告御状，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明宪宗经过几次派人调查，严厉斥责朱仕燁“为兄则不仁，为父则不义”，并最终作出最后裁决：朱仕燁、朱成银、朱成鑽、朱仕燁包括朱仕燁全部废为庶人，其中朱仕燁父子留居京城。朱仕燁、朱仕燁兄弟守襄垣恭简王陵园守墓，此外朱仕燁革去禄米和冠带，迁回大同居住，不允许其返回蒲州。最终，朱仕燁父子三人皆被留在京城，明宪宗唯恐三人串通为恶，将朱成银、朱成鑽二人发往凤阳高墙守祖坟，仅留下朱仕燁一人。襄垣恭简王共五子，长子和第四子被废，第三子留居大同，次子早夭，襄垣王府宗室的管理任务交给了此前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五子朱仕燁。《明武宗实录卷八十八》载：“乙亥，初代藩襄垣王仕与镇国将军仕燁坐事降为庶人，仕成铎、成铎，仕燁子成银俱未封。至是管府事，镇国将军仕燁为请。礼部议成铎等皆其父未革爵时所生，宜封。成银坐冒封革事，请如例给半禄。许之。”史书记载，朱仕燁进封襄垣王的时间是嘉靖十八年（1539），距离朱仕燁被废已经过去了63年，此时，朱仕燁年事已高，在尚未接受正式册封之时便已去世。嘉靖二十年（1541）二月，朱仕燁嫡长子、辅国将军朱成鏊袭封襄垣王。朱成鏊去世之后，其曾孙朱允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五月以襄垣王府曾孙的身份暂摄府事。但朱允焯在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二月被朝廷下旨革去藩王身份，仅以辅国中尉管理府事。至

谦恭贤德的山阴王

第一任来蒲的代藩山阴康惠王朱逊焯（1409—1467），明太祖朱元璋代简王朱桂庶四子，天顺五年到蒲。史书记载，代王朱桂共有10个儿子，其本人生性脾气古怪，性情残暴，府内诸王子们争夺嫡位激烈。好在朱逊焯身体病弱，没有参与争斗，最后运气较好地被迁到富庶的蒲州。成化三年，朱逊焯去世。清《永济县志》记：山阴康惠王墓，在东县北文学村。

第二任是端裕王朱仕燁（feng），山阴康惠王之子。弘治十七年（1504）《大明山阴王墓志铭》记载：简王实封于代，享有桑干之地。山阴王朱仕燁，6岁随父朱逊焯来到蒲州，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精通周易太极之术，且礼贤下士，食宿朴素，出入乡间，没有一点王爷架子，就算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他，也不与之计较，毫无明王派头，时人称“贤王”。朱仕燁生于景泰丙子年（1456）二月，薨于弘治癸亥年（1503）十一月，葬于蒲州三张里，成化六年（1470）五月获封山阴王，谥号端裕。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南阳王鸿儒为其撰墓志铭。他生有二子，长子成鏊嗣王，次子成鏊封镇国将军。

第三任是荣靖王朱成鏊。据明嘉靖十五年（1536）《大明山阴荣靖王墓志铭》记载：朱成鏊，号进德斋，康惠王长子，十岁受封，少时很聪颖，熟读经书，通大义，继承端裕王琴瑟之艺。至孝，父亲端裕王尝患痼疾，成鏊亲侍汤药，常常衣不解带；端裕王痘疮溃烂，成鏊以口吮之，且每天焚香祈祷上苍，乞求父亲疾病得到痊愈，希望自己代替父亲得病。明正德丙寅年，继承封王后，更是谦恭谨慎，不轻出入，后构建书院著书，率诸子教学其中，皇上赐名“进德书院”，所做一切事情必定遵循朝廷旨意。荣靖王在蒲州从不仗势欺人，平易待士，从不侵占蒲州百姓土地财物，且每次遇到旱灾，都要亲自斋沐祷神求雨，祈求百姓丰衣足食，所以蒲州人民都称颂他为“德王”。荣靖王生活早逝，小时候没受到良好的照顾，年轻时就掉了牙齿，平日生活质量堪忧。经过王府搬迁一顿折腾，到了蒲州后就卧床不起。长子朱仕燁在请求朝廷派御医为父王治病的同时，提出以代世子身份代理襄垣王府事。明英宗认为朱仕燁此举是“乘父之病，夺其禄位”，特地写敕书对其进行训诫，并在暗中调查发现朱仕燁之所以会有此举动，是因为两个弟弟朱仕燁（jǐ）、朱仕燁安因以庶夺嫡，即反对其二子予以严厉警告。天顺六年（1462）襄垣王朱逊焯去世，享年53岁，赐谥曰恭简，清《永济县志》记：襄垣恭简王墓，在东县孟石桥北。成化元年（1465）九月，新继位的明宪宗朱见深册封襄垣恭简王长子朱仕燁为襄垣王。朱仕燁，是朱逊焯和萧氏的嫡长子，然而，襄垣王朱逊焯和他父亲朱桂一样，不重视嫡长子，并且与嫡长子的关系势同水火，甚至到了父欲杀子的地步。朱仕燁与弟弟朱仕燁、朱仕燁，为了争夺王位，可以说是互相拆台、相互告御状，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明宪宗经过几次派人调查，严厉斥责朱仕燁“为兄则不仁，为父则不义”，并最终作出最后裁决：朱仕燁、朱成银、朱成鑽、朱仕燁包括朱仕燁全部废为庶人，其中朱仕燁父子留居京城。朱仕燁、朱仕燁兄弟守襄垣恭简王陵园守墓，此外朱仕燁革去禄米和冠带，迁回大同居住，不允许其返回蒲州。最终，朱仕燁父子三人皆被留在京城，明宪宗唯恐三人串通为恶，将朱成银、朱成鑽二人发往凤阳高墙守祖坟，仅留下朱仕燁一人。襄垣恭简王共五子，长子和第四子被废，第三子留居大同，次子早夭，襄垣王府宗室的管理任务交给了此前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五子朱仕燁。《明武宗实录卷八十八》载：“乙亥，初代藩襄垣王仕与镇国将军仕燁坐事降为庶人，仕成铎、成铎，仕燁子成银俱未封。至是管府事，镇国将军仕燁为请。礼部议成铎等皆其父未革爵时所生，宜封。成银坐冒封革事，请如例给半禄。许之。”史书记载，朱仕燁进封襄垣王的时间是嘉靖十八年（1539），距离朱仕燁被废已经过去了63年，此时，朱仕燁年事已高，在尚未接受正式册封之时便已去世。嘉靖二十年（1541）二月，朱仕燁嫡长子、辅国将军朱成鏊袭封襄垣王。朱成鏊去世之后，其曾孙朱允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五月以襄垣王府曾孙的身份暂摄府事。但朱允焯在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二月被朝廷下旨革去藩王身份，仅以辅国中尉管理府事。至

据《内阁大库档案》载，接下来是：山阴康惠王朱逊焯、山阴庄宪王朱俊榘、朱允焯、朱廷理、朱肅、朱鼎济等。

山阴庄宪王朱俊榘，山阴康惠王朱逊焯嫡长子。朱俊榘多才艺，好佛数，数次上书请求让宗藩参与科举，明神宗没有回应。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明世宗册封朱俊榘袭封山阴王，朱俊榘父子留居京城。朱俊榘、朱俊榘兄弟守襄垣恭简王陵园守墓，此外朱俊榘革去禄米和冠带，迁回大同居住，不允许其返回蒲州。最终，朱俊榘父子三人皆被留在京城，明宪宗唯恐三人串通为恶，将朱成银、朱成鑽二人发往凤阳高墙守祖坟，仅留下朱俊榘一人。襄垣恭简王共五子，长子和第四子被废，第三子留居大同，次子早夭，襄垣王府宗室的管理任务交给了此前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五子朱仕燁。《明武宗实录卷八十八》载：“乙亥，初代藩襄垣王仕与镇国将军仕燁坐事降为庶人，仕成铎、成铎，仕燁子成银俱未封。至是管府事，镇国将军仕燁为请。礼部议成铎等皆其父未革爵时所生，宜封。成银坐冒封革事，请如例给半禄。许之。”史书记载，朱仕燁进封襄垣王的时间是嘉靖十八年（1539），距离朱仕燁被废已经过去了63年，此时，朱仕燁年事已高，在尚未接受正式册封之时便已去世。嘉靖二十年（1541）二月，朱仕燁嫡长子、辅国将军朱成鏊袭封襄垣王。朱成鏊去世之后，其曾孙朱允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五月以襄垣王府曾孙的身份暂摄府事。但朱允焯在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二月被朝廷下旨革去藩王身份，仅以辅国中尉管理府事。至

后裔无考的凄凉

明朝末期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1627—1664），对明勋皇室及分封在各地的藩王后人给予了无情的镇压。农民军每到一地，首先捕杀明朝皇族，亲王、郡王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官殿，在连绵的战争中，无不灰飞烟灭。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楚王等数十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比如在山西，农民军在平阳杀了西河王一族300余人，在太原先杀了晋王一族中高级皇族400余人，后又捕杀了中底层宗人千余人，在大同则杀了代王一系4000多名宗室成员。据统计，仅在山西一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屠杀了朱元璋后代一万多人，以致于藩王后裔或被斩抄家、或隐姓埋名流亡外地。自此，蒲州及全国的明藩王淡出历史。如生活在江西省南昌市的明末清初画家朱奄（dā），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成为中国画一代宗师。现在，明朝襄垣王系辅国将军朱成鏊的墓葬所在地永济市蒲州镇宝泉村，至今有一条巷名叫朱家巷，但目前没有一户人家姓朱。永济市柳头镇朱小张村，以朱姓为主，据《河东解梁朱氏家谱》记载，解梁朱氏为明皇族后裔，因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战争“靖难之役”而逃离南京，先祖张名小张逃至此地，故名朱小张村。据此分析，他们不应是山阴王、襄垣王的后裔。如今永济市蒲州一带，朱姓人数也不多，没有明确记载是明王后裔。